
中国近代 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王汎森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近代 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王汎森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 王汎森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2
ISBN 978-7-5463-3901-6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①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1463号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作 者: 王汎森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 周殿富
策 划 人: 严搏非
责任编辑: 武 学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凝
开 本: 960mm×1300mm 1/32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 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3398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3901-6

定价: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本书探讨道光到1930年代大约一百年间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这里必须声明的是：我并不是在写一部通论近代思想、学术的书，而只是对这一段历史中比较为人所忽略的层面做一些研究。我个人认为从道光以来，中国思想界便进入不安定期，每一种学问都因内外的挑战，而产生了分子结构的变化。它们催化了后来一些范畴性的转变：在经学上，否定了过去两千年的经学传统，认为它们都是围绕着一批“伪经”而积累的学问（康有为）。在文化上，充分了解到儒家文化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安定层（傅斯年）。在道德上，发现过去两千多年所有的道德教训，关涉私德者居十分之九以上，而关于公德者不到十分之一（梁启超）。在政治上，认为过去两千年是无治状态（刘师培），国其实不成其为国，因而有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转化为“国家”，由“臣民”转化为“国民”、“公民”。对专制体制的深刻反省则发现中国没有“社会”，也有人认为过去两千年的治政理论都是“在空架之上层层描摹”（毛泽东）。不管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有多少实质的转变，但至少的思想或理念的层次上这是一个断裂和跳跃。同时，这些新思想新概念，也回过头来极深刻地改变了近代的学术论述。

收在这里的文章并不是有系统地写成的，因此先天上有了两种限制。首先，因为机缘不同，所以文章有详略之异。第二，正因

2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为这些文章是随着不同的需要而写成的,所以并没有预想一个系统。我之所以将它命名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是因为这些文章中似乎仍有一条线索。第一部分:“旧典范的危机”,从晚清内部思潮的变动开始。方东树的例子,是讨论方氏对汉学的攻击在晚清思想史中之意义。方氏此举,显然并不只是理学的回潮,同时也代表了新时代的动向。有关邵懿辰的文章,则是探讨邵氏的一本小书,如何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了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后来逐步扩大,成为近代庞大的疑古运动的一个根源。邵氏的一些论点,代表了在时代的催化之下,传统内部的思想因子产生的蜕变。太谷学派的出现,则代表当时的下层知识分子利用传统的思想资源,以因应时代困局的一次并没有成功的努力。这三篇文章,各自从不同的侧面,说明晚清思想的不同面貌;《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一文则在说明晚清汉族历史记忆的复活如何改变当时的政治文化,同时也讨论了新的历史记忆资源如何颠覆了官版的历史记忆,而为晚清的历史变动埋下种子。以上四篇文章分别谈清季上层及下层知识分子的四种变化,它们设定了一个背景,并作为以后诸篇文字发展的张本。

第二部分是“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其中的两篇:《从传统到反传统》、《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都是提纲式的文字;《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一文,尽管是针对特定的现象而写,但也可以看做是从特定的角度谈从传统到现代曲折而蜿蜒的发展路径。“传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与使用中获得它的活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中改变它的风貌。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想了解传统与每一个时代的关系,必须将那个时代主动的诠释与使用考虑进去,而不应局限于线性的因果关系。

传统与现代复杂的纠缠,也表现在私人领域上。近代中国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是无所不在的国家化、政治化,公领域如此,思想、学术如此,即使日常生活也有逐步政治化的倾向,而以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为其高峰。本书收了一篇《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

化》，便是有关这个现象的举例性探讨。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思想资源”的重大变化。在《“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一文中，我用晚清的例子来说明：“思想资源”之转移以及“概念工具”的变动，如何改变一个时代的思想面貌。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讨论了当时中国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但我绝不是想通盘讨论所有相关的细节，而只是想藉此说明，如果不考虑“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之变化，对当时思想界的变迁就难以理解了。

人是诠释性的动物，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之后，人们会用它来作为思考自己处境及命运的工具。在 William H. Sewell 研究法国大革命之劳工问题的书中，作者发现新的词汇与概念使得劳工们用来思考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境况的方式产生了改变。在工厂中过着艰苦生活的人，可能浑然不觉，也可能用许许多多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处境，但是有了“阶级”的概念时，便可能赋予当前处境一种全然不同的意义。语言与概念非但表达了社会的现实，它也“建构”了社会事实。在近代中国，文化菁英先是使用一群旧概念去诠释新东西，但慢慢地一批又一批新的概念涌入，并逐步建构了现实的发展。大约 1920、1930 年代，“阶级”概念逐渐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胡适说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名词运动，并在一次演讲中说“一些抽象的，未经界定的文词发挥了魔幻而神奇的效力”，“别小看一些大字眼的魔幻力量”，其实即说明了新名词、新概念建构现实的力量。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一文，说明西方的学说如何能以中国的面貌出现，而中国当时的困境又何以能够逼使这类思想更易于为人接受。同时，从刘师培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两难，一方面是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一方面又是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学者挣扎于一个艰苦时代的痕迹。

第三部分是：“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1905 年废除

科举,千年以来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一方面解放了儒家正统文化思想的限制,一方面也迫使八股文化下的旧士人走投无路,一批文化菁英由传统的“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做官不再是他们惟一的出路,他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建立一个学术社会”(顾颉刚)。读者会发现这一组文字大多和傅斯年有关。傅斯年当然不是“建立学术社会”的惟一代表,但他毫无疑问的是一个灵魂人物,而我个人恰好对他做过比较集中的研究,自然也就多写了几篇和他有关的文章。在这一组文章中,《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是姐妹作,它们都讨论古史多元观的形成与传播,我希望用它们作例子来说明一个学术诠释典范形成的历程。而在当时的学术界,有许许多多这种新诠释典范出现。此外,这两篇文字也可以看出现代思想中讲求多元、强调变化的观念如何体现在学术研究上。《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一文,则以身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傅斯年为例,说明他成学的经过、他的志业以及当时学术界“新”、“旧”、“公”、“私”之间的纠缠与冲突。《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一文,则以一件个案来说明学术上从旧到新的转变,以及牵涉其中的社会政治因素。上述各文直接或间接说明了现代知识分子在建立一个新“学术社会”上的努力。

《“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则指出近代中国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要学术独立,免于政治及道德教条之干扰;一种是愈来愈强的“主义崇拜”,希望以“主义”来指导一切。这两股力量的冲突表现在许多事物中,本文则是以陈寅恪为例,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仕分途以后,这个新“学术社会”的命运。

同时,在本书的一些文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始终不曾消失的紧张性。道光咸丰以来,传统学术极力挣扎着改变自己,以求扣联政治、社会,而在民国新学术运动开展之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学术的社会性与平民性始终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想步趋西学,建立以问题意识为取向的新学术,同时也希望“为学术而

学术”，将政治与道德教条对学问的干扰减到最低。但人们很快地发现：追求学术独立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学术研究与现实致用之间的紧张，及学术社群的自我异化的问题。而把所研究的事物彻底“对象化”、把“价值”与“事实”分离之后，也使许多学者产生了生命意义的危机感。

在编辑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曾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加以删改；为了使眉目更为清楚，几篇文章的名字也作了更动。《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原题是《方东树与晚清学风》（《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一文，原题《邵懿辰与清季思想的激烈化》（《大陆杂志》90卷3期）。《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原题《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研究的回顾》（《新史学》五卷四期）。《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原题《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孙敦恒等编《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集》），《“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原题是《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二十一世纪》45期）。《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原题是《刘师培与清末的无政府主义》（《大陆杂志》90卷6期）。《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一文原题为《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116期）。《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原题为《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原题是《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两种危机》（《当代》123期）。此外，我也对几篇文章的副标题作了增删。《从传统到反传统》一文发表在《当代》一个讨论反传统思想的专辑（《当代》13期），其中也采撷了我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书的一小部分及《章太炎的思想》的一篇附录。《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思与言》34卷3期）有一篇姐妹作《历史记忆与历史：以中国近世史事为例》，发表在《当代》91期（1993）我所编辑的“历史记忆”专辑，这应该是台湾学术界最早讨论“历史记忆”的一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有关太谷学派的一文，发表于1994年，

当时并未能直接读到太谷学派的经典,而是以回顾二手研究的方式写成,所以径注页码于文中。该文主要是想探讨它在晚清思想脉络中的意义。我个人得以见到大量太谷学派的遗经是晚近的事。

此书编校的过程迁延至三四年,拖了这么多年才完成,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对我而言,将这些文章收集出版是一件痛苦的事。多年前与出版公司签订了一张契约,言明要编成一本近代思想史的论文集,但这件事一再延搁,始终不曾付诸行动。如果没有陈平原兄为河北教育出版社向我苦苦催逼(按:本书有一个所收文章较少的简体字版在该社出版),我大概是无法辑成这本小书的。本书台湾的联经版原与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同时进行,但因为增补了一些新文章,并进行了一些修改,所以稽延至今,应该在此郑重说明。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老友刘季伦先生,他对本书的编辑过程费过很大的心血,提供宝贵的意见。此次修订,曾参考汪荣祖先生书评之意见,特此致谢。林志宏学弟及家弟王昱峰等人费心校对本书,我要特别在此谢谢他们。初编此书时,我个人适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作客,我也想趁这个机会感谢那里的朋友们。

新旧篇名对照表

原 篇 名	更 动 篇 名
方东树与晚清学风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
邵懿辰与清季思想的激烈化	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
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	“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
刘师培与清末的无政府主义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
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	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续表)

原 篇 名	更 动 篇 名
读“傅斯年档案”札记	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 ——读“傅斯年档案”
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价值与事实的分离? ——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两种危机	“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

目 次

自 序	1
-----------	---

第一编 旧典范的危机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	3
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	23
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的研究	39
汪梅翁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	60
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	94

第二编 传统与现代的辩证

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	111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	133

2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	161
“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	183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197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 主义讲习会”	223
思潮与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	243
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	277

第三编 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

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 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307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323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346
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381
“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 中心的考察	469
附录一 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	495
附录二 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523
索引	532

第一编

旧典范的危机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

近代思想变化的起点究竟是什么时候？是鸦片战争吗？讨论近代思想时，可以直接从汉学谈到新学吗？在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第三种思想力量，也就是宋学的复兴？而宋学的复兴究竟只是一种古代学说单纯的回潮，还是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动向？

首先必须指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内部已面临几种挑战。第一是内治的问题，动乱接踵而来，各种制度也出现问题，尤其是风俗道德方面，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官僚的贪污腐化。正因为人们对贪污腐化触目惊心，所以会出现像魏源（1794—1856）等人的“挑菜会”以及倭仁（1804—1871）等人的“吃糠会”〔1〕。第二种挑战是大家所熟知的鸦片及外夷的问题。

鸦片战争之前传统学问已经起了种种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学术内在发展的结果；汉学内部出现了许许多多因内在问题而产生的所谓“典范危机”。但最重要的是知识与现实、知识与人生的关系出现裂痕。当时知识分子有一个疑问：为何考证学如此发达，出版的书这么多，而现实世界如此龌龊混乱？这个现象显然与清初大儒的主张相违背。清初大儒说，研求圣经贤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再返三代之治。但是清季学者开始质疑这个

〔1〕 关于挑菜会，见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北京：中华，1981），页201，《人日以七种菜餽客，约同人和之》及《人日选韵诗》。

大前提：将三代社会的真相弄得愈清楚，好像也愈不可能把三代的理想付诸实行？是因为人们不肯留心致用，还是因为六经的社会与清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以致不可能将六经原原本本地行诸当代？简言之，这时候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知识与现实世界断裂”的危机感。人们怀疑当时居学术界主流地位的汉学考据，究竟与现实政术及道德风俗有何关联？这一门学问是不是完全失去了现实关照性，以致于学术自学术、社会自社会，汗牛充栋的考据学著作非但不能为现实世界带来一尺一寸的进步，反倒有恶劣的影响？

在《书林扬觝》一书中，方东树（1772—1851）便将当时学问与现实世界的巨大断裂说得非常坦白、非常激烈。这本书虽然是在道光十一年（1831）刊行的，但发愿撰写则在道光五年（1825）的春天。他说当阮元（1764—1849）创建学海堂书院的来年，阮氏首先以“学者愿著何书”问堂中学生，方东树听了觉得非常感慨，他认为这个问题大错特错，阮元不应该只问学者想写什么书，而不问所写的书有什么用。故他慨叹后世著书太容易，“殆于有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于是发愤写成十六篇文章，其中有不少直接或间接批评清儒拼命著书而不管现实的风气。他在终篇中说：

藏书满家好而读之，著书满家刊而传之，诚为学士之雅素，然陈编万卷，浩如烟海，苟学不知要，敝精耗神与之，毕世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此只谓之嗜好，不可谓之学〔1〕。

这段话必须放在道光学术的背景下看。方氏是针对乾嘉学者拼命考证著书，只管在学术社群中树立地位与声望，而不管他们的专业研究与整个社会的福祉是否有任何关系而发的，所以他说那样拼命著述，如果“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则只能

〔1〕 方东树：《书林扬觝》，在《书目类编》（台北：成文，1978），第92册，总页41516—7。

说是“嗜好”，不能称之为“学”。所谓“学”，照传统儒家的理想，应该是承担天下国家的实政实务。故他说：

君子之学，崇德修愿辨惑，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之于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明体达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不然，虽著述等身，而世不可欺也〔1〕。

方东树代表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转弦易辙的士大夫共同的想法。他们都不满意当时学问的性质以及学问与社会的关系，他们想追求一种理想的人格，简言之，一种整合政事、文章与道德为一体的整体观念。

他们也为宋学，乃至整个宋代伸冤，认为许多考据学领袖无情地攻击宋学，乃至“使有宋不得为代，程朱不得为人”〔2〕。他们认为宋学不但是中国学术的高峰，而且宋儒对先秦儒家的把握，其实是最高明的，宋儒对现实的关照也远胜于考证学者。这一个将文明发展之注意力由汉转向宋的方向，是清代后期思想史中一个关键性的变化。

以上这些观点基本是鸦片战争以前知识圈中的一个“意见气候”（climate of opinion）。不过毫无疑问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这一发展变得更加激烈。如果不能掌握上述的“意见气候”，便不能了解方东树的思想倾向，而如果不能掌握方氏的思想倾向，就不能了解他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了《汉学商兑》这部奇书。

在这里我要先用《仪卫轩文集》中的材料，来说明方东树的思

〔1〕 方东树：《书林扬解》，总页 41517。

〔2〕 朱雅题辞，在《汉学商兑题辞》，方东树：《汉学商兑》（台北：台湾商务，1978），页 1。